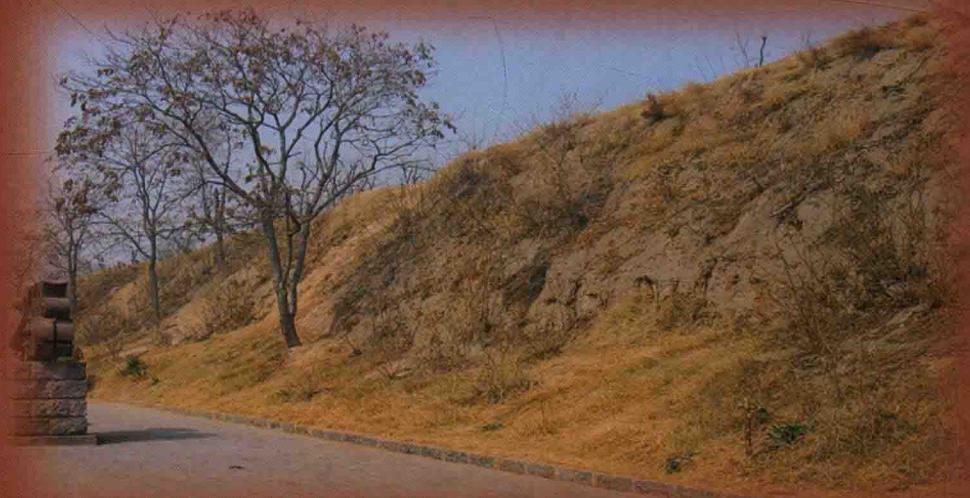


郑州商城遗址考古研究

ZHENGZHOU SHANGCHENG YIZHI KAOGU YANJIU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编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中原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一凡

封面设计：阳 光



ZHENGZHOU SHANGCHENG YIZHI KAOGU YANJIU

ISBN 978-7-5347-8449-1

Barcode for the book's ISBN.

9 787534 784491 >

定价：260.00元

郑州商城遗址考古研究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编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郑州商城遗址考古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347-8449-1

I . ①郑… II . ①河… III . ①古城遗址 (考古)
—研究—郑州市—商代 IV . ①K878.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2017 号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郭一凡

责任校对 钟 骄

封面设计 阳 光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郑州测绘学院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1.375 印张

字 数 753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0 元

序

河南是华夏中原腹地的一方热土，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南来北往，东传西播，河南成为古人类文化交流都要经过的十字路口。新石器时代，河南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头。夏商周以降，有 22 个中央或地方王朝在这里建都，河南又长期居于全国的核心地位，造就了华夏古文明金字塔顶端的辉煌。新中国成立之后，配合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在河南全省包括省会郑州，持续进行了田野考古发掘，有许多重要的大发现。以郑州为例，先是在郑州二里岗发现了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遗址，后又发现了闻名中外的郑州商城，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里程碑上一个耀眼的刻度。郑州商代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郑州商城被评为 20 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郑州市也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并进入中国八大古都的行列。

今年恰逢郑州商城发现 60 周年，是值得我们考古人庆祝的节日。忆往昔，1950 年秋，郑州南学街小学教师韩维周先生，在郑州市东南郊二里岗一带采集到一些商代陶片和石器，发现了郑州商代遗址。1952 年秋，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在郑州二里岗进行考古实习，发掘出丰富的商代遗存。1953~1955 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郑州二里岗、南关外、紫荆山北、白家庄、铭功路和人民公园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郑州商代遗址分布很广，东起凤凰台，西逾西沙口，北越花园路，南过二里岗，遍布整个市区，面积达 25 平方公里。1955 年秋，在郑州白家庄西北部即今黄河医院门前，发现在两座商代房基下面，还叠压有商代夯土层，并向东南和西北方向延伸。夯土层东南方向的一端，进入白家庄西寨墙，又一直向南与郑州老城东城墙内的夯土相连；夯土层西北方向的一端，穿过紫荆山沿金水大道南侧继续向西，到杜岭街东侧折而向南，与郑州老城西城墙内的夯土相接。而南城马路和熊耳河北侧的郑州老城南城墙内也有相同的夯土，这四面相连的夯土围成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垣。其中东城墙和南城墙各长约 1700 米，西城墙长约 1870 米，北城墙长约 1690 米，总周长约 6960 米。经过对四面城墙的多次发掘，证明这是一座比安阳殷墟还要早的商代城址。

又通过其后多年的考古发掘，让我们了解到郑州商城的布局：郑州商城中部偏北和东北部为宫殿区，有大量带有石柱础的夯土建筑基址，宫殿区内还有大型水井、蓄水池、石砌管道等供输水设施。城北有铸铜作坊和制骨作坊，城西北有烧陶作坊，城南有铸铜作坊。在西城墙北段外侧和南段外侧，以及东南城角外侧，布列有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青铜器窖藏坑，内置大量的大型方鼎、圆鼎和其他青铜礼器、兵器。在东城墙南段、南城墙及西城墙南段外侧约 600~1100 米处，发现有外城墙。郑州商城出土有数以万计的商代陶器、石器、骨器、蚌器、青铜器、玉器、印纹硬陶、原始瓷器、象牙器、金器、卜骨、卜甲及

习刻字骨等遗物，反映了一座商代前期王都的面貌。

史称三代的夏商周时期，处在古代文明起源的大发展阶段，学术界公认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四个方面特征，即有城址，有青铜器铸造，有古文字遗存，有祭祀和礼制建筑。郑州商城的考古发现，全面彰显出这些特征。郑州商城本身，就是一座古代文明起源的丰碑，大量的青铜器、兵器及生产工具等金属器的铸造，一些陶文符号、习刻字骨和个别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一些以狗为牺牲的祭祀坑、多座与祭祀有关的青铜器窖藏坑和近在咫尺的郑州小双桥大型商王室祭祀遗址的存在，展现了高度发展的王国文明时代，大大提升了郑州商城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使人们得以了解早于安阳殷墟 200 多年商代前期的考古学文化分期和历史面貌，并为探索夏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个甲子的时间过去，郑州商城的考古发掘不但连连有重大发现，与之相伴的考古学研究，也是硕果累累。先后有《郑州二里岗》《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郑州商代铜器窖藏》《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等多部考古大报告问世，又有 70 多篇关于郑州商城的考古发掘报告和考古发掘简报发表。与此同时，还出版了《灿烂的郑州商代文化》《郑州商城初探》《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早商文化研究》《商代前期都城研究》《郑州商城研究》等一批学术专著；还发表了 300 多篇有关郑州商城的研究论文，呈现了 60 年来郑州商城的考古发现和科学研究成果。

诚然，科学研究与学术争论也多是相伴相随的。以郑州商城的性质为例，在 20 世纪 50 年代郑州商城发现之前，邹衡、赵全嘏、安金槐几位先生就把郑州商代遗址与亳地联系起来。《文物》1961 年第 4、5 期上，发表了安金槐先生的《试论郑州商代城址——亳都》，正式提出郑州商城为仲丁“亳都说”，其后虽有个别不同意见，亳都说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16 年过去，到了 1977 年 11 月，在国家文物局召开的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邹衡先生首次提出郑州商城为商汤“亳都说”，并在《文物》1978 年第 2 期上，正式发表了《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一文，在学术界引起了旷日持久的大争论，这是极为正常和可喜的现象，也是促进社会科学发展和繁荣的必由之路。1983 年偃师商城的发现，1995 年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的发掘，1996 年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都给郑州商城“亳都说”和“亳都说”的学术争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变数，这就大致形成了两种学术观点不同的思路和轨迹。坚持郑州商城“亳都说”的学者们认为：夏王朝早期是自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开始的，登封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当为禹都阳城，而偃师二里头遗址则是夏代晚期的都城，商代是从二里头文化四期时开始的，偃师商城早于郑州商城，是商灭夏后所建最早的王都，即汤都西亳，郑州商城是仲丁的亳都，郑州小双桥遗址则是属于郑州商城的王室祭祀遗址。坚持郑州商城“亳都说”的学者们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不是夏文化，夏王朝是从二里头文化一期时开始的，一直到二里头文化四期，偃师二里头遗址自始至终都是夏代的王都，商代是从二里岗文化开始的，郑州商城早于偃师商城，是商汤之亳都，而偃师商城是商代的桐宫或军事重镇，郑州小双桥遗址则是仲丁自郑州商城所迁之亳都。现在看来，上面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都有一定的科学依据，都有其存在的道理，但同时又都不能立于绝对确证的优势地位，都有应该修订的缺陷，都有值得继续研讨深思的空间。

值此郑州商城发现 60 周年之际，我们出版了这本《郑州商城遗址考古研究》，把 60 年来学术界关于郑州商城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选编在一起，有全面论述郑州商城考古发现

的，有考证郑州商城始建年代的，有分析研究郑州商城性质的，有探讨郑州商城历史地位的，可谓百花齐放，篇篇精彩。文章的作者中，既有已经谢世的考古学前辈，也有仍在耕耘的老考古人，还有一批工作在第一线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这诸多的考古研究成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观点有相同的和相近的，也有不同的甚至抵牾的，但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郑州商城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给予精心的探求和解读，反映出他们求索新知的智慧，共同勾画出郑州商城的灿烂辉煌。追溯并吸取了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信息，实践着“传承文明，开拓创新”的格言，为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郑州商城发现 60 周年到来的时候，让我这个参与郑州商城发掘和研究 40 多年的老兵作序，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再回首，几代人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我们十分怀念韩维周先生，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曾是河南古迹研究会的工作人员，是郑州商代遗址的发现者，首创之功，功不可没。我们十分怀念安金槐先生，他被誉为“新中国河南考古第一人”，他是郑州商城“敞都说”的倡导者，对郑州商城的发现、发掘和研究，作出了无可替代的重大贡献。我们十分怀念邹衡先生，他是郑州商城“毫都说”的开创者，北京大学考古系的资深教授，桃李满天下，对郑州商城的考古学研究同样作出了无可替代的重大贡献。这些考古老前辈们，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献出了毕生的精力，赢得了学术界永远的景仰和尊敬。

我们期待今后在郑州商城能有更多的考古发现，用未来的新资料，去催生、审视、修订、补充更多的研究成果。通过考古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利用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研究，加强交流与沟通，互相学习和启迪，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使郑州商城的研究再上新的台阶，共同推动考古学科的大发展。

是为序。

杨育彬
2015 年 4 月

郑州商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述评

秦文生 宋国定 贾连敏 王文华

一、前言

20世纪50年代中期郑州商城遗址的发现，是商代考古的一座里程碑。正是这一重大发现，揭开了商代城址考古研究的序幕。经过60年的调查、勘探及科学发掘，尽管对城址性质是汤之毫都或仲丁之厥都的认识还有分歧，但学界普遍认为，郑州商城遗址是一处以商代前期二里岗期商文化为主，兼有晚期夏文化、先商文化、中商文化和晚商文化的大型商代都城遗址，且多数学者倾向于汤之毫都。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郑州商城遗址确定为“商前期年代学研究”课题中的一个专题，由此来确立夏商文化分界的界标和建立商代前期的时空框架。同时，因为郑州商城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无可替代的学术地位，使得郑州在2004年被正式列为中国八大古都。

二、遗址的发现和认识过程

（一）二里岗遗址的发现及郑州商城遗址的确认

1950年秋，郑州南学街小学教师韩维周先生在河南省郑州市旧城外东南约1公里的二里岗一带首先发现了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1]。此后数年，经过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该遗址的继续调查与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又相继在郑州旧城内外发现了丰富的商代文化遗存^[2]。

1955年秋，在郑州商代遗址的中部发现郑州商城^[3]。这是当时国内发现最早的一座有夯土城墙的商代都城遗址，是我国商代考古的一项重大发现，从而揭开了商代城址研究的序幕。然而，确认郑州商城的年代和性质却颇费了一番周折。

1955年10月，在郑州白家庄村西北（今黄河中心医院东侧）的黄委会宿舍区以东铺设下水管道工程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段夯土堆积，通过对该夯土区的钻探，发现夯土层分别向东南和西北方向延伸，形成了一道基本呈南北走向的夯土墙，那么这道夯土堆积究竟具有什么功能？形成于哪个年代呢？因为从发掘现场的堆积情况分析，夯土堆积位于黄沙土上，可能与古代某个时期的拦水堤坝有关；有人认为该夯土堆积形制规则，长宽均在20米以上，很可能是古代大型墓葬的墓道；但随着夯土堆积的不断向南和向西延伸，人们逐渐放弃了原来的推测。查找夯土范围的钻探工作一直持续到了年底，夯土的长度并

没有停下来的意思。1956年上半年，沿着夯土的两端继续钻探，发现该夯土堆积向南延伸到了郑州老城的东城墙下，西折延伸到郑州老城的南城墙下，并一直延伸到西南城角的警报山再向北转弯，沿南、北顺城街一路向北，从杜岭街的东侧穿过金水河折向东，在地下一直延伸到紫荆山下，又向东南接到白家庄的西北，形成一个基本为长方形的四周封闭的城址。从解剖的情况看，城址的年代应在商代二里岗期。就这样，一个周长近7公里的商代城址，一步步地被揭示了出来。

（二）郑州商城遗址的主动考古工作

郑州商城遗址发现以后，围绕其城墙结构、年代，城内宫殿区位置及遗址性质等做了大量的主动性考古工作。主要分勘探和发掘两个方面：

1. 文物勘探工作

1955年底到1956年上半年，为了弄清夯土城墙的走向和范围，沿着城东路西侧、金水路南侧及杜岭街以东进行勘探，从平面上解决了郑州商城的形制和保存现状。

1973年，郑州商城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寻找宫殿遗址^[4]。根据以往配合基本建设而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中得到的线索，以城内东北部的东里路为中心，进行大面积普探，发现该区域断断续续遍布着商代二里岗期的夯土建筑基址。通过考古发掘，已发掘出数十座大小不等的商代建筑遗存。这无疑又大大提高了郑州商城遗址的地位与价值。

2. 考古发掘工作

1956年秋，为解决郑州商城城墙的营造方法和建筑结构，在商城四面城墙开挖探沟十八条。通过对商城城墙进行解剖发掘，到1957年秋，基本解决了城墙的地层叠压关系、筑法等相关问题，同时认定城墙的修筑年代大体相当于商代二里岗期。

1972年秋，在对郑州商城进行全面复探的基础上，针对有些专家的怀疑再次对城墙进行解剖发掘。这次在东城墙、西城墙、南城墙分别开挖了探沟，并在东城墙底部发现被夯土叠压的洛达庙期文化层，同时发现南城墙的底部打破了南关外期文化堆积，从层位上卡住了郑州商城建造年代的上限，证明郑州商城是一座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前期城址。

除上述宫殿区的钻探和郑州商城四面城墙的解剖发掘外，与郑州商城遗址相关的考古发掘绝大多数都是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工程而进行的抢救性发掘。

三、郑州商城遗址考古工作的四个阶段

1. 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50年代中期（1950年秋至1955年9月）：遗址的发现与初步认识，典型遗址的发掘和研究。

1950年秋，郑州二里岗遗址的发现，带动了郑州文物工作的开展。此后的五年左右时间，在以郑州二里岗及老城区为中心的广大区域陆续发现商代文化遗存。它们分别是：

发现商代早期文化层直接叠压龙山文化层的层位关系。

发现有卜骨、青铜器和祭祀遗迹。卜骨为牛肋骨，残长约7厘米，上面刻有10个文字，经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鉴定，这些文字是当时的一种习刻文字，称该字骨为“习刻字骨”^[5]，这是继安阳小屯发现商代甲骨文以后的第二个发现商代文字的地区。

发现郑州商城外郭城墙。为配合郑州铁路局东站北侧仓库工程，在二里岗遗址东北部

发现一道东北西南走向的夯土墙基槽，长约300余米，宽约7米，深5米左右，夯土层厚度在10厘米左右，夯土层面有明显的夯窝痕迹，沿着夯土墙基继续进行钻探，初步确认该墙基向东北一直延伸至凤凰台村西，西南延伸到今南关大街时折向西北，探明长度为2100多米。后经发掘证明，这段夯土墙基就是郑州商城外郭城的南墙东段^[6]。

在郑州市南关外（今河南省运输公司院内）发现了一处铸造青铜器的作坊遗址^[7]。并在铸铜作坊遗址的东侧，发现一条商代壕沟，沟内上层堆积为二里岗期下层遗存，沟内下部为商代南关外期文化层，此即后来学术界所谓的“南关外类型”。在郑州紫荆山以北（今新华社河南分社院内）发现制作骨器的作坊遗址和紫荆山（今河南饭店院内）铸铜作坊遗址；在铭功路北段西侧（今郑州市第十四中学院内）发现商代制陶作坊遗址^[8]。

在白家庄遗址和白家庄墓葬区的抢救性发掘中，发现晚于二里岗上层的新的文化遗存，后来学术界称之为“白家庄期”^[9]。

在人民公园内发现商代遗址及墓葬区，并进行抢救性发掘。在墓葬区发掘的一座二里岗期的墓葬出土了铜爵、原始青瓷尊、陶豆、陶盆及玉器等10件遗物，该墓葬被商代晚期文化层叠压，说明郑州二里岗期商文化与安阳殷墟晚商文化间存在明显的早晚关系^[10]。

2.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叶（1955年10月至1974年8月）：郑州商都遗址的勘探与发掘。

1955年10月，在郑州商代遗址的中部发现郑州商城。接着，为解决城墙的走向、筑法、结构和地层叠压关系，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郑州商城的四面城墙开挖探沟二十条，对了解城墙的营造方法、平面形制、走向和年代等均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该阶段发掘清理的遗存有：郑州西南郊的洛达庙遗址、紫荆山北的铸铜遗址、铭功路西侧的商代墓地、杨庄墓葬区等。

1966年至1971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影响，郑州商城的考古工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进展甚微。

1972年，郑州商城考古工作恢复进行。1973年，重点转在城内寻找大型宫殿基址。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首先在商城的东北部进行了钻探，发现在近30万平方米的范围之内，分布着数十座大小不同的夯土建筑基址，由此推定该区域即是当时统治集团处理政务和集中居住的区域。通过发掘，在商城内东北部（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商城工作站院内）发现大型房屋基址七座，这是在商城以内发现的第一处大型建筑基址群。由此揭开了郑州商城宫殿遗址的神秘面纱。

这一阶段在对郑州商城进行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的同时，学术界还就发掘资料进行了整理和研究。主要学术成果有：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金槐先生等编写的《郑州二里岗》考古发掘报告；北京大学邹衡先生的《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11]；许顺湛先生的《灿烂的郑州商代文化》^[12]；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一队编著的《郑州市商代遗址的发掘》^[13]；安金槐先生的《谈谈郑州商代瓷器的几个问题》^[14]和《试论郑州商代遗址——敖都》^[15]等。

《郑州二里岗》一书，全面论述了二里岗文化遗址出土的遗迹和遗物，并对遗址的分期和断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邹衡先生的《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系统地研究了二里岗期商文化及其与殷墟晚商文化的关系。作者认为二里岗文化上下层之间关系“紧密衔接”，应是一个文

化整体；而其上层即晚期“比起小屯商文化甚至它的早期来还要早一些”，从而确定了二里岗文化与殷墟文化之间的早晚关系。

安金槐先生的《谈谈郑州商代瓷器的几个问题》，对所谓的商代“釉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郑州商城遗址发现的青釉陶器，实际上已具备了瓷器的特性，并称之为“原始青瓷”。该文还通过大量的文化因素分析，并参照化验数据，又提出了北方原始青瓷独立起源的观点，这在中国陶瓷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安金槐先生的《试论郑州商代遗址——亳都》一文，明确指出郑州商城的性质应是商王仲丁所迁的亳都。

3.20世纪70年代中叶至80年代中期（1974年9月至1985年6月）：结合科研课题对遗址进行勘探、发掘和综合研究。

20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郑州商城遗址的考古重点是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工程而进行的勘探和发掘。

文物钻探工作，集中在寻找宫殿区的范围和解决城内布局两个方面。通过大面积普探和重点复探的方法，基本摸清了内城范围以内商代文化遗存的分布规律和宫殿区的大致范围。

抢救性考古发掘在城内多个地方取得重大进展：宫殿区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促使学者开始思考商代宫殿建筑的规模、布局和结构，同时探讨建筑的年代、分期和功能等，进而又开始讨论城址的始建、使用和废弃的年代等；郑州商城西城墙外侧杜岭铜器窖藏坑和郑州市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坑的发现，出土了十数件商代王室重器——青铜礼器，使得对商代前期青铜铸造技术的研究成为可能。因此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都是围绕郑州商城的年代与性质和商代前期青铜器铸造工艺等展开的。

这一时期的主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有：

1974年9月，在郑州商城西墙外杜岭一带（今张寨南街）发现一个青铜器窖藏坑^[16]，出土两件铜方鼎和一件铜鬲。其中一号方鼎通高100厘米，是郑州商城遗址迄今出土的最大的一件青铜方鼎。1982年7月，在郑州商城东南城角外侧（今向阳回族食品厂内）又发现一座青铜器窖藏坑^[17]，出土十三件青铜礼器，其中两件大方鼎，一件大圆鼎，两件扁足圆鼎和尊、罍、盘、中柱孟、卣等，其中的提梁卣造型别致，通体花纹，为商代前期所仅见。

在郑州商城东北部宫殿区的发掘，以C8G10保存较好，这是一座近南北向的夯土建筑基址，夯土表面发现有圆形的柱洞，活动面和墙基均被后期破坏。重要的是在房基上面发现一条南北向人工挖掘的壕沟，壕沟时代为白家庄期，沟内出土人头骨80余个，不少人头骨上留有明显的锯痕，其中40余个较完整。这些人头骨遗存，应为人祭活动留下的产物。经过鉴定，这些人多属于青壮年男性。有专家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将其作为器皿使用有一定关系^[18]。在郑州商城中部偏北（今黄委会水利科学研究所南院），发现一处大型建筑基址群，其中以房基C8G15保存较好，南北长13.6米，东西残长65米，基址面上保存有两排石柱础，这是迄今在郑州商城发现的最大一座宫殿建筑基址。另外还在郑州商城东北部（今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办公楼前）发现一处大型建筑基址群，其中以C8G16保存较好^[19]。

在郑州商城东北部（今黄河医院内），发现一座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夯土台基，台基被

战国文化层叠压，文化层内出土有大批戳印在陶豆表面的“毫”字陶文，陶豆的时代约为战国晚期^[20]。

配合修建商城路，在管城区政府门前东侧，发现有商代夯土堆积，由于揭露面积有限，对整个夯土遗迹的面貌已无法弄清，但至少可以说明，在接近郑州商城的中部，仍存在有夯土堆积，对于探讨宫殿区的范围提供了新的线索^[21]。

对铸铜和制骨作坊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出二里岗期的房基、灰坑遗迹和铸造铜器的残范及大量的废弃骨料等遗物。

墓葬的发现比较零星，在北二七路^[22]、二里岗、城内东北部和西城墙内侧护坡等地均有发现，有的墓葬还随葬成套的青铜礼器。

祭祀坑和窖穴也有发现。在郑州商城中部（今郑州市中级法院前院内）发掘的一座窖穴，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骨匕、卜骨等；另在郑州商城外郭城南城墙内侧（今郑州市木材公司院内）发现的窖穴中，有一件大口折沿绳纹罐内出土石戈19件（也有学者认为是石镰），很可能与守卫城墙有关。

在研究方面，围绕着郑州商城宫殿区的年代，城址分期、性质及青铜器窖藏坑的年代、青铜铸造工艺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河南省博物馆与郑州市博物馆联合发表的《郑州商代城址发掘报告》^[23]，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1955年以来郑州商城遗址的主要发掘成果，并对该城的年代和性质进行了探讨。

邹衡先生发表了《郑州商城即汤都毫说》^[24]一文，首次提出郑州商城应是商代开国君王成汤所都毫邑的新说。

邹衡先生出版的《夏商周考古论文集》^[25]一书，根据新出土的考古资料，将郑州地区二里岗文化进行了新的分期，他首先把整个商文化分为先商、早商和晚商三期七段十四组，把郑州的“南关外期”以及原来属于二里岗下层文化的C1H9等单位列于先商文化的第一段第二组；把原来属于二里岗下层文化的C1H17等单位列于早商文化的第一段第三组；把原来属于二里岗上层文化的C1H2等单位列于早商文化的第一段第四组；把原来属于二里岗上层文化的C1H1等单位列于早商文化的第一段第五组；把白家庄遗址上层的单位列于早商文化的第一段第六组；把白家庄铜器墓等单位列于早商文化的第一段第七组。另外，还对郑州商城为汤都毫邑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证。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的《郑州新发现商代窖藏青铜器》^[26]，安金槐先生的《郑州新出土的商代前期大铜鼎》^[27]，裴明相先生的《郑州商代铜方鼎的形制和铸造工艺》^[28]和《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青铜容器概述》^[29]，杨育彬先生的《郑州二里岗期商代青铜器的分期和铸造》^[30]和《从郑州新发现的商代窖藏青铜器谈起》^[31]等不仅对青铜器窖藏坑的位置、开口层位、形制与结构、主要包含物及伴出器物等作了详尽的介绍，同时还论证了窖藏坑的年代和性质，进而对商代二里岗期青铜容器的铸造工艺进行了推测复原。通过对青铜方鼎、扁足圆鼎、提梁卣、尊、罍等容器制作技术分析，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掌握了复杂的青铜铸造工艺，青铜铸造业在当时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的《郑州商代城内宫殿遗址区第一次发掘报告》^[32]，全面介绍了郑州商城宫殿区的考古发掘成果，报告除对宫殿区的范围和布局进行详细阐述外，还重点介绍了几座宫殿建筑基址的平面形制、结构和建造年代等。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写的《郑州北二七路新发现三座商墓》^[33]，重点介绍了1982年在郑州北二七路中段路东发掘的三座商代铜器墓。其中一号墓保存完好，平面为长方形，墓底铺有1厘米厚的朱砂，棺下有一长方形腰坑，腰坑内殉葬一狗。墓内随葬品较多，有铜鼎、铜斝、铜爵、铜觚、铜刀、铜片、玉戈、玉铲、玉柄形器、玉璧、玉饰、石戈、石铲、石柄形器、石钵、骨匕、骨簪、骨镞、牙饰、涂朱圆陶片等。其中石钵较为罕见。这批墓葬位于商代遗址中，它的发现，为寻找郑州商城的墓葬区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杨育彬先生撰写的《郑州商城初探》^[34]一书，收集了郑州商城的大量考古资料，结合古代文献，对郑州商城进行了综合研究和探讨。

郑杰祥先生根据自己对甲骨文和先秦文献的研究体会，结合考古资料，于《中国史研究》发表了《商汤都毫考》一文^[35]。

陈旭先生的《郑州商城宫殿基址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36]，对郑州商城宫殿基址的年代进行了论证，并对郑州商城的年代和性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4.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1985年7月至2015年2月）：配合基本建设工程项目抢救性发掘，重点解决学术课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郑州市的城市建设步伐日趋加大，旧城改造的规模和速度不断加快，因此，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工程项目而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也越来越多，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为解决与郑州商城相关的学术课题提供了更多的资料。

这一阶段郑州商城遗址发掘的重要考古发现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外郭城墙的调查、试掘以及城墙年代与性质的认定^[37]。

从1953年发现郑州商城外郭城南墙算起，到80年代中期已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时间。这一时期内，尤其是1955年发现郑州商城内城以后，郑州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对郑州商城内城的研究上。外郭城的真正被认识和开始工作是80年代中期以后。1985年6月，在郑州商城南墙以外的今市木材公司至烟厂街南端发现一段外郭城墙；同年，在郑州火车站广场以南一马路东侧振兴商场的施工中，也发现了夯土堆积保存完好的外郭城西墙墙基；另外在郑州饭店东侧，也发现一道夯土墙基，向北一直延伸到东方红影剧院门前。经钻探，发现墙基向北延伸到今西太康路南侧，向南延伸到陇海路一带。1987年春，通过钻探和试掘，将郑州市南关外陇海铁路附近发现的各段夯土墙基本上连接了起来，形成一条自郑州商城南墙以外呈不规则弧形环抱内城的墙圈。1991~1992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工作站在三德里和花园新村的发掘中，又发现了一段略呈西北—东南向的转角形夯土墙基，这里距郑州商城西南城角约1100多米。1993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工作站在郑州饭店扩建工程中，于福寿街西侧、兴隆街北侧的交会处，发现商代外郭城西城墙从基建区中部呈南北向穿过。2000年和2001年，为配合郑州紫荆山南路拓宽改造工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工作站在陇海铁路与紫荆山南路交叉口北侧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一段南墙墙基和护城河遗存。2002年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对城西、东、北三面进行了考古钻探和发掘，证明郑州商城的外郭城应是商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通过城墙、护城河以及商城以东大面积的湖面包围内城而形成的郭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来在位于郭城西南城角的银基商贸城和解放路北侧兴华幼儿园，即郭城西墙中部相应位置的抢救性发掘中均发现有夯土堆积，这些为确定外郭城西墙的位置和西南城角提供了佐证。

二是郑州商城内城西、南城墙的解剖和城内三道夯土墙的年代和性质推测。

在郑州市紫荆山路通过的郑州商城南城墙中部，共开挖南北向探沟四条。通过发掘可以看出，南城墙顶部保存宽度7米左右，底部宽22.5米，残高5.5米。城墙底部有宽5.9米、深0.4米的基础槽。城墙夯土层较薄，夯窝密集，质地纯净，结构坚硬。从地层叠压关系看，有二里岗上层一期文化层叠压城墙内侧根部。商代夯土的外侧被战国晚期附加的夯土堆积所叠压，内侧则为汉代以后至宋代的夯土堆积。

配合河南省新华书店图书城工程建设，在郑州商城西城墙中部对郑州商城的西城墙进行了大面积发掘，进一步弄清了商代夯土城墙的营造方式和结构，同时在打破城墙的堆积中发现4座商代墓葬^[38]。

郑州商城东北部宫殿区内发现的一段“夯土墙”基^[39]，因其位置特殊，年代较早，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该夯土墙基编号W22，位于郑州市顺河路西段南侧，黄河水利委员会青年公寓大楼基础部分的西侧，基本呈东北—西南走向。两次发掘揭露长度约100米，基槽宽度7米左右，“在W22的夯土层内既出土有二里岗下层时期的罐、尊、鼎、盆、簋、缸、澄滤器、瓮、器盖、甗等陶片，也出有早于二里岗下层的遗物，如花边口沿罐、鼎足、鼎腹、豆盘、盆等陶器残片，没有发现晚于二里岗期下层的遗物”。由此推测，该夯土遗迹属于“二里岗下层时期的夯土墙”^[40]，后来的发掘者指出：“打破夯土墙的两个灰坑H56、H114的出土物可能要早于二里岗下层，最晚可至二里岗下层偏早阶段H9的时期。”“从夯土墙打破遗迹中的出土物和打破夯土墙基遗迹的包含物分析，夯土墙基的始建年代不早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亦不晚于郑州二里岗下层一期，其建筑及使用时间应大体相当于二里岗下层的H9阶段。”“关于这段夯土墙的性质，我们认为它不大可能是宫城的围护墙，该段夯土墙基础宽8米余，似接近一道城墙的特征。”^[41]

安金槐先生认为“就商代宫殿区内这段商代夯土墙基的基础槽形制、夯土层厚度与夯杵窝印痕的形制大小看，基本和郑州商城的基础槽与外郭城墙基础槽相类同。再者从宫殿区内这段商代夯土墙的地层叠压与打破关系看……应是属于商代二里岗下层二期修筑的，其修筑时间应和郑州商代城的内城城墙与外郭城墙是同步的”^[42]。

杨育彬先生则认为该夯土墙基“始建于二里岗下层偏早阶段”^[43]。

袁广阔先生认为该夯土墙的始建年代应为洛达庙晚期^[44]。

李伯谦先生也认为“W22的始建年代应在洛达庙晚期，不会晚到二里岗下层一期之时”^[45]。

王学荣等先生认为该夯土墙“首先可排除是房基，而肯定为墙基。……由W22夯土中出土的陶片判断，W22夯土基址的始建年代不早于偃师商城商文化第一期早段(1段)。……与郑州二里岗C1H9所代表的二里岗下层一期大体相当”^[46]。

在东里路东段北侧的北大街住宅楼建设工地，也发现一段商代夯土墙。墙仅存基槽部分，呈西北—东南方向，基槽宽约3米，发现长度约60余米，深约1.1~1.4米，墙基槽直接打破生土，向东西两个方向继续延伸。从层位关系看，墙基槽上部被二里岗上层二期遗迹打破。结合出土物和周围环境分析，该夯土墙很可能是宫城北墙的一部分，墙的北部是与之平行的输水管道和蓄水设施，这种平面布局与偃师商城池苑遗址南侧为宫城所作的格局大致雷同，在这道夯土墙以北就很少发现具有一定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了^[47]。

在配合紫荆山路的考古发掘中，在郑州市城北路以南，紫荆山路东侧发掘出一道东西

向夯土墙，基槽宽约 5.6 米，残深 3.8 米，长度已达百米以上，从层位叠压关系和夯土包含物看，其时代约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二期，因该阶段郑州商城已开始逐步走向衰落，一些宫殿建筑被废弃，文化堆积的分布范围在逐渐缩小，因此我们认为该夯土墙可能与“白家庄期”的文化分布范围以及郑州商城宫殿区南侧的卫护墙有关^[48]。

三是宫殿建筑基址的发掘与解剖以及年代序列的建立。

郑州商城遗址宫殿区的发掘无论从面积还是地点来看都不算少，但除了 20 世纪 70 年代几个地点的大面积发掘外，大部分都很难对基址进行全面揭露，其主要原因是：首先，从夏末商初开始直到今天，郑州持续作为城市存在，大到王都、军事重镇，小到县城、商贸集镇，数千年的沧桑变化，朝代更迭，战事频仍，天灾人祸，城市从规模、布局，到官府建筑、民居房舍乃至手工作坊等均不断发生变化，后代对前朝的破坏，同一时期的推陈出新使得城址下面变得错综复杂，因此，越是早期的遗存，遭到破坏的程度越大，尤其是那些位居高亢地带的宫殿遗址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扰动。其次，发掘地点往往受到地理位置的局限，如道路、楼房等地物或永久性建筑，使考古发掘只能在相对狭小的空间进行。再者，配合基本建设而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受到发掘面积的局限，发掘地点多以工程项目为单位，建筑又以单独的住宅楼、办公楼或商业房为主，因此一般情况下，揭露的面积不可能太大。最后，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在过去的发掘实践中，将城墙和夯土建筑基址这样无法移动的遗迹，是作为象征一个城址和遗址中最重要的部分看待的，因此，处于保护文物遗迹的需要，多数夯土遗迹在清理至最上一层夯土面的同时，就暂停发掘，最多也只是象征性地挖个解剖沟，这样从平面和结构上对了解夯土建筑的规模、年代和发展序列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这里我们介绍的夯土建筑基址，也只能按发掘地点和建设单位分别介绍，对于那些发掘面积较大，叠压打破关系复杂的发掘项目将做重点阐述。

郑州市保险公司东里路家属院发现商代夯土基址两处。

郑州医疗机械厂、黄委会锅炉房等地点，发现大面积的商代夯土堆积。

在配合郑州电力学校的发掘中，清理出残破夯土台基 1 座，面积 500 平方米，年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时期^[49]。

在配合黄委会 61 号、62 号住宅楼工程的发掘中，发现商代夯土建筑基址 2 座，其中 1 座保存较好。有商代柱础坑 22 个，排列有序*。

在郑州回民学院内发掘中，清理出二里岗文化下层夯土建筑基址 3 座，基址下面叠压有“洛达庙期”文化堆积*。

在紫荆山路北段西侧的民族小区也发现一座二里岗下层时期的夯土基址，平面呈曲尺形*。

在郑州市东里路东段路南的河南中医学院家属院内，发现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夯土建筑基址 3 座*。

在郑州商城内东北部南侧的郑州丝钉厂发掘出面积较大的夯土建筑基址 2 处，南侧 1 处为东西长条形，长度 70 余米，南北宽 2.2~2.3 米。在夯基上有长方形柱础 55 个，应是廊一类的建筑。东部 1 处长 40 余米，发现一排圆角方形柱础槽，每边宽为 1~1.4 米之间，中间有直径 0.4 米的木柱灰痕，其下都埋有柱础石。时代约为二里岗上层一期*。

在郑州市东里路东段路北今郑州皮毛工艺厂院内东侧，发现 2 座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的夯土基址*。

在黄河中心医院，发掘出2座二里岗上层一期的夯土建筑基址*。

在东里路38号院发掘出一座大型宫殿基址，基本呈南北走向，略偏西南。南北长25米，东西宽16米，并有7排柱础槽，每排有柱础槽14个。柱础槽间距1.9~2.3米，槽内下部均放置有柱础石*。

在配合郑州回民中学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一处商代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保存较好，长约40米、宽约14.30米，保存夯土厚度1.25~2.15米。在夯基南北两侧分布有成排的柱洞和柱础石。夯土基址下发现有较早的灰坑和墓葬*。

配合黄委会1~5号综合楼工程，对位于郑州市紫荆山路西侧，顺河路以北、金水河南岸的基建区进行大面积发掘，发现叠压打破关系复杂的商代夯土基址13块。平面形状多已残缺不全*。

配合河南省歌舞剧院住宅楼工程在紫荆山路与城北路交叉口西南角发现商代夯土基址2处*。

在商城东北部今东里路东段北侧，郑州市北大街居民住宅楼工程工地，发现层层叠压的夯土建筑基址20余座和二里头文化晚期的灰坑等重要文化遗存。这些地层关系，被列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一组典型地层，为确立夏商分界的界标以及解决郑州商城的始建年代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考古学上的根据^[50]。

四是城市水利设施的新发现。

在郑州市黄河中心医院南半部的发掘中，发现1处石板砌筑的商代蓄水设施，西北—东南方向，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20米，深约2.5米，用经过加工的青石板铺底，圆形或不规则形石块砌壁。时代为二里岗上层一期^[51]。

蓄水设施的东南不远处，在北大街居民住宅楼的发掘中发现了一道西北—东南走向的供水管道。该管道位于宫城墙以北4米处，已发现长度约40米，由地下夯土沟槽、石板筑水管道和汲水井三部分组成。沟槽平面为长方形，断面呈倒梯形，口宽11米，底宽3米。底部中间为长方形石板砌筑的供水管道，管道截面近方形，其上盖有3米多厚的夯土，管道底部有淤积的纯净细黄沙及贝壳、河蚌壳等；汲水井位于夯筑沟槽的中部，向下打破夯土与石板筑水管道相通。井平面呈长方形，长2.5米，宽1.5米，南半部均有二层台。汲水井发现四个，间距均为8米左右，可能与汲取清水、清淤或控制水量有关。该供水管道向西北延伸应与蓄水设施相通。在郑州商城东城墙内侧的郑州医疗机械厂西院内西北角，也发掘出一段石板砌供水管道，为东北—西南向，其结构与北大街所见基本相同，方向与之垂直，应为同一条管道的不同部位。配合黄委会1号高层宿舍楼建设，在郑州市顺河路西段路南的发掘中，发现一条西北—东南向的输水管道，其底部和两壁均为夯土，其上面盖有石板，该输水管道上宽0.68米，下宽0.79米，高0.50米。在管道东端壁上还发现四组用来控制水量插木板闸阀的竖向窄沟槽，向东南延伸也可与黄河中心医院发现的蓄水池相对应。从其地层打破关系和出土陶片看，该输水管道建于二里岗上层一期，使用到了二里岗上层二期^[52]。

除在郑州商城宫殿区附近发现布局合理、结构复杂、原理独特的蓄水设施和输水管道外，在商城东部以及东北部宫殿区范围内如今郑州电力学校院内、郑州丝钉厂、河南中医学院家属院、郑州医疗器械厂等地点的考古发掘中，还多次发现结构复杂的商代夯筑水井。如郑州电力学校食堂工地发现的商代水井，井框平面呈长方形，但在井框外有一个直

径近9米的椭圆形坑，口大底小，略呈锅底状。井框底部用榫卯结构做成一个木质长方形井盘，井盘上用不规则圆木做成高1.5米的“井”字形框架，木井框外侧附贴0.30~1.0米的青膏泥；井盘内铺有20~30厘米厚的碎陶片和汲水时损毁或掉下来的汲水器，碎陶片层的作用主要是澄沙过滤。这为研究商代前期的凿井技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53]；郑州医疗机械厂西院也发现由夯土井坑、井台和井筒组成的大型商代水井一眼。这些水井的年代均为二里岗上层一期。

五是青铜器窖藏坑年代和性质的新认识。

郑州商城遗址的青铜器窖藏坑共发现三个^[54]。窖藏坑的分布位置、结构、包含物、时代上均具有鲜明的特点。1975年，在郑州商城西城墙外的杜岭张寨南街，发现了一个商代二里岗期的窖藏青铜器坑，坑内埋有2件铜方鼎和1件铜鬲。其中1号方鼎高1米，腹部与四足装饰有带状饕餮纹与乳钉纹，是目前郑州地区出土形体最大的一件铜鼎。1982年，在郑州商城的东南城角外侧的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院内，又发现了一个青铜器窖藏坑，坑内埋有铜方鼎2件、大圆鼎1件，还有扁足鼎、卣、尊、罍、盘、觚等共13件。1996年，在郑州商城西城墙南段外侧的南顺城街以西，发现第三个青铜器窖藏坑，坑内埋藏铜方鼎4件，并有簋、斝、爵、钺和戈等12件青铜器。经过对三个坑位置、层位关系、埋藏方式、坑内填土的质地和颜色以及对所藏器物的处理方法等方面的比较发现，这三个商代窖藏铜器坑，均位于郑州商城的城墙外侧附近，坑的底部均坐落在生土上。坑内埋藏青铜器的方法，都是形体较小的铜器套装在较大的铜器内，其放置情况皆井然有序，均为利用曾废弃的商代窖穴或水井。特别是已发掘的三个窖藏坑内放置的青铜器中，各类器物多成对出现，方鼎不仅是偶数且已接近列鼎形式。另外从铜器铸造工艺分析，三个坑中所出器物年代有早有晚，埋藏的时间有的是二里岗上层时期，也有的晚于郑州商城的最晚阶段——白家庄期，却又早于安阳殷墟的最早阶段。至于其成因，应与特殊的国家政治事件有关。因为集中埋藏这些商代王室的重要青铜礼器，显然不是社会有序状态下所发生的正常现象。也有学者认为埋藏有序，与商代王室祭祀活动有关。

80年代中期以后，对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一直在紧张进行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陆续发表多篇考古发掘简报或报告，历史考古学界对郑州商城遗址的研究也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相继出版学术专著三部，分别为《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55]、《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上、中、下）、《郑州商代铜器窖藏》^[56]等。发表考古简报、报告和论文百余篇。如《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报告》^[57]《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铸铜遗址》^[58]《1992年度郑州商城宫殿区发掘收获》^[59]《郑州南顺城街青铜器窖藏坑发掘简报》^[60]《河南郑州商城宫殿区夯土墙1998年的发掘》^[61]《郑州商城北大街商代宫殿遗址的发掘与研究》^[62]《郑州商城外郭城的调查与试掘》^[63]等报告都及时详细介绍了郑州商城遗址各类遗存的发掘收获。专家、学者更是在最新考古材料的基础上，重新检视自己的观点，补充或修正用于立论的论据，发表新的论著与别人进行热烈的讨论。这些代表不同观点的著作不仅活跃了学术气氛，同时对郑州商城考古学研究早日达成共识也大有裨益。因篇幅所限，这里仅列数篇，不一而足。如邹衡先生的《郑州商城是商汤灭夏前后的毫都》^[64]，李伯谦先生的《对郑州商城的再认识》^[65]，安金槐先生的《关于郑州二里岗期陶器分期问题的再探讨》^[66]，杨育彬先生的《再论郑州商城的年代、性质及相关问题》^[67]，秦文生先生的